

李葆嘉 司联合 李炯英 译

欧美词汇语义学理论

[比] 德克·吉拉兹 (Dirk Geeraerts) 原著

跨学科名作译著系列 李葆嘉 主编

出版公司

C13028133

H03
19

语言科技文库
跨学科名作译著系列

欧美词汇语义学理论

Theories of Lexical Semantics

[比] 德克·吉拉兹(Dirk Geeraerts) 著

李葆嘉 司联合 李炯英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北航

C1637367

H03
1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美词汇语义学理论/(比)吉拉兹(Geeraerts, D.)著;李葆嘉,司联合,李炯英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2
ISBN 978-7-5100-5653-6

I. ①欧… II. ①吉…②李…③司…④李… III. ①词汇学—语义学—研究—欧洲②词汇学—语义学—研究—美洲 IV. ①H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5526号

© Dirk Geeraerts 2010

“THEORIES OF LEXICAL SEMANTICS, FIRST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10.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欧美词汇语义学理论

著者:[比]德克·吉拉兹
译者:李葆嘉 司联合 李炯英
责任编辑:梁沁宁

出版者: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版人:张跃明
发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北京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100010 电话:64077922)
销售:各地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
印刷: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1mm×1245mm 1/24
印张:18
字数:397千
版次: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版权登记:01-2012-8209

ISBN 978-7-5100-5653-6

定 价:4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南京师范大学
国家“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语言科技创新及工作平台建设”

《语言科技文库》

总主编 李葆嘉

| | |
|-----------|-------|
| 计算语言学研究系列 | 陈小荷主编 |
| 语义语法学研究系列 | 李葆嘉主编 |
| 汉语方言学研究系列 | 刘俐李主编 |
| 古代汉语学研究系列 | 黄征主编 |
| 语言教学与研究系列 | 肖奚强主编 |
| 语言新专题研究系列 | 倪传斌主编 |
| 跨学科名作译著系列 | 李葆嘉主编 |

《语言科技文库》总序

李葆嘉

当代语言学已经进入了一个科学与技术的互补时代，信息处理水平成为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知识世界的载体是语符系统，信息处理的根本对象是语言信息处理。与计算机的出现使得语言符号有可能成为数据处理对象相似，神经科学实验仪器设备的应用，使得在大脑神经层面探讨语言机制成为可能。这些无疑都引导语言研究走向科技化，“语言科技新思维”（李葆嘉 2001）应运而生。所谓“语言科学”包括理论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分支学科，所谓“语言技术”指语言研究的现代技术手段，包括语言信息处理、语音实验分析，以及语言的神经、心理和行为实验分析的技术手段等。就语言信息处理而言，又可以分为语料库研制技术、知识库研制技术、知识挖掘和抽取技术、句法信息处理技术、词汇信息处理技术、语音信息处理技术、语义信息处理技术、语用信息处理技术等。

2001年5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创办了史无前例的“语言科学与技术系”，率先迈出了从传统文科教育范型向现代科技教育范型转变的步伐。“十五”期间，南京师大“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语言信息处理与分领域语言研究的现代化”（陈小荷教授主持），以基础平台建设、资源建设和理论探索等为主，迈出了语言科技研究的一大步。

“十一五”期间，南京师大文学院、外国语学院和国际文化教育学院联袂申报“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该项目以“语言科技”为引导，以“多学科交叉、跨院系整合、开放型营运”为理念，建设具有前瞻性、原创性、成长性的语言科技高级工作平台。以典型课题的工作原理为核心，进行资源开发和系统研制，拓展语

音科技、二语习得的神经机制研究、言语能力受损儿童的语言能力研究等新方向。同时造就新一代学术领军人物和培养一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以期形成一支高水平的交叉学科团队。该项目设计，体现了工作平台建设、理论创新、应用研究、人才培养、团队建设的学科发展一体化思路。其旨趣在于，加速语言研究从传统文科范型向现代科技范型的转变，以引领 21 世纪语言科技的新潮流。

作为新兴交叉学科项目，通过教育部组织的专家匿名评审，“语言科技创新及工作平台建设”（2008～2011）获批，总投入 1000 万元。总体而言，这一“语言科技创新”团队，分支学科齐全，专业知识互补。涵盖了理论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义科技、语音科技、实验方言学、历史语言学、神经语言学、二语习得研究、话语行为语言学等领域。这一期间，项目组成员获批的国家级基金项目达 20 多项。该项目理念之前瞻、实力之雄厚、工程之浩大、经费之保障，为学界瞩目。

2008 年秋，本项目以南京师范大学语言科技研究所为实施单位正式启动。主要有三大任务：建设一个领先性的语言信息科技实验室、建立一个独创性的语言科技工作平台、撰著一套有特色的语言科技文库。

从实验室方案设计到设备招标采购，再到实验室用房改造，经过 8 个月的努力，2009 年 12 月，语言信息科技实验室建成，为语言研究从传统范型向科技范型的转变提供了基本保障。该实验室划分为实验工作区、科研工作区和管理服务区。实验工作区建有语音实验与计算室、神经认知实验与计算室、课堂话语实录室三个专门实验室。科研工作区建有语义科技工作室、语音科技工作室、方言实验工作室、知识工程工作室 I（先秦词汇）、知识工程工作室 II（中古词汇）、知识工程工作室 III（敦煌俗语言文字）、语言习得神经机制工作室、语言习得中介机制工作室，以及参研工作室。管理区服务包括办公室、管理室、编辑室和交流室。出席“语言科技高层论坛暨语言信息科技实验室落成仪式”（2009 年 12 月 14 日）的专家认为，该实验室体现了语言学跨学科研究的当代性和先进性，具有整体性、科技型、开放型三个特点，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是“语言科技新思维”的又一体现。同时认为，该实验室的科研工作涵

盖了四个二级学科、四个博士学位点，有稳定明确的研究方向，有合理的设计规划和很好的科研基础；整体设计合理，功能齐备。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标准衡量，很多方面超过了指标。

语言科技工作平台是基于工作原理（课题定位—理论方法—技术路线—关键技术—评估方式）而建设的高级平台。一方面，从语言信息、语言知识和语言机制三个层面，围绕典型课题进行设备配置、资源建设和软件开发；一方面，将典型课题研究和工作平台建设融为一体，依据典型课题建设的子平台应具有解决同类课题的功能。

建设语言科技工作平台的目标是要实现语言研究手段的技术化和模型化，总体设计包括三个二级平台和八个子系统。

一、语言信息工作平台 1. 语义科技工作系统（李葆嘉教授主持）：基于词汇语义—句法语义的一体化研究思路，开发“人—机交互语义标注工具”，研制“深度语义标注信息库”；研制“幼儿（2~6）日常话语跟踪语料库”，完成幼儿语义系统和话语行为分析研究。2. 语音科技工作系统（顾文涛教授主持）：研制“多语言、多语境、多语用的语音语料库”，基于声学信号分析、感知实验和数学建模，完善语音韵律理论与相关技术应用。3. 方言实验工作系统（刘俐李教授主持）：完成“网络版汉语方言有声语料库”，拟定系统的可操作性语音、词汇、语法实验模型和研究方法，进一步完善新兴交叉学科“实验方言学”。

二、语言知识工作平台 1. 先秦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系统（陈小荷教授主持）：研制“先秦文献语料库”、“专名知识库”、“汉语词汇档案库”等，开发先秦文献自动分词算法、古籍版本异文自动发现算法、同指专名检索软件工具等，完成“先秦汉语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2. 中古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系统（董志翘教授主持）：研制“中古文献语料库”、“专名知识库”、“中古汉语词汇档案库”等，开发中古文献自动分词和标注工具等，完成“中古汉语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3. 敦煌俗语言文字统计与检索系统（黄征教授主持）：研制“敦煌文献资料库”、“敦煌文献俗语词语档案库”，开发相应工具，完成“敦煌文献资料与知识检索”。

三、语言机制工作平台 1. 二语习得的神经机制研究系统（倪

传斌教授主持):研制“英语受蚀词汇库”等,基于行为学、脑成像和脑电三维度模型,进行中国人英语习得与磨蚀的神经机制研究,完成“基于神经机制的英语个性化学习分析系统”。2. 二语习得的中介机制研究系统(肖奚强教授主持):研制“留学生汉语口语中介语语料库”,基于中介语理论、对比分析理论、偏误分析理论以及二语习得影响因素等,完成“留学生汉语习得的中介机制研究”。

这一工作平台,既是科技研究平台,也是人才培养平台,即一个现代化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体系。

作为本项目的文本成果,《语言科技文库》包括计算语言学研究、语义语法学研究、汉语方言学研究、古代汉语学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新专题研究六个系列。其总体特征为:领域的开拓性、理论的创新性、选题的新颖性、方法的交叉性、考据的精审性、成果的应用性。在研究过程中,除了数据采集分析、资源建设和软件开发,更重要的还是要有新思路、新理论和新材料。陈小荷提出的先秦文献信息处理新方法,从先秦典籍注疏文献中挖掘出用于自动分词和词义消歧的知识,再注入已开发的古汉语分词和词性标注工具中去,所取得的先秦古籍版本异文自动发现、先秦词汇知识自动挖掘等成果均具开拓性。李葆嘉提出的语义语法学理论和话语行为理论,基于研制专用语料库或语义信息库和技术手段,开拓了语义网络建构、深度语义分析和话语行为研究等新的领域。刘俐李建构的实验方言学理论和方法,为方言学向现代科技方法的转型研究提供了新路,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黄征多年来从事敦煌文献及其俗语文字研究,古代汉语学研究系列中的敦煌文献校录整理,以及敦煌写本字词考释、以古佚和疑伪经为中心的敦煌佛典词语和俗字研究、两汉声母系统研究等新见迭出。肖奚强基于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二语习得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界已经产生了影响。钱玉莲的汉语介词与相应英语形式比较研究等专著各有亮色。倪传斌依据语言测试和认知实验等数据,从行为学、生理学和语言学三个层面分析影响中国英语学习者外语磨蚀的相关因素。刘宇红基于隐喻的理论探讨,对各类隐喻形式的结构、特性和解读规律进行了多视角的深入探讨。

《语言科技文库》所收论著,由作者在2008年12月申报选题,

2011年始逐步完稿。系列主编审读了书稿，主要就其学术价值、章节安排、内容关联、行文表述、图表绘制等方面，提出审阅意见。此后，作者们对书稿又进行了修改和润色。《语言科技文库》的作者，大多数是具有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对于我们这些20世纪80年代走进语言学研究领域的而言，出版论著可能已不足为道。然而，对于年轻学者而言，其论著的出版既是几年来研究的结晶，也是对其继续探索的促进。换言之，“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年轻教师搭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科研和教学平台。学科带头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提携后进。

尽管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或学术研究是一种个人的探索行为，然而复杂问题的研究，无疑需要群体协作。“学科建设”或团队合作模式，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个新概念。这种模式涉及总体规划、多方协调，是需要付出精力和心血的。2008年，通过投票方式推举我担任该项目总负责时，就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劳动班委”。2009年，前往安徽大学拜访黄德宽教授时，曾谈到“学科负责人的任务就是规划设计，争取项目经费和提供科研设备设施”，得到黄教授的赞许。2010年，申报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时，评审专家柳士镇教授提问的“作为一个交叉学科项目，各学科之间的协调是怎么考虑的，有什么做法”，可谓一语中的。作为后学，深知交叉研究之艰、学科整合之难。相关学科之间的整合协调需要借助行政机制，但凭借行政方式并非就能完成。当时的回答是，目前做到的是建成了一个可以合作研究的场所，至于学科之间的进一步沟通合作应有较长过程。有一点很明确，只有通过交叉项目，相应学科才能渗透，合作者才能逐步磨合。我们只是在一步步探索。

十一五期间的“211工程”建设项目即将完成，但是学科建设的任务并没有结束。2010年，“语言信息科技研究中心”被评审为江苏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语言科技”这一交叉领域注入了新的建设活力。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除了“跨院系整合、多学科交叉、开放型运行”理念，需要凸显“合作性攻关”。围绕交叉性项目，实施计算语言学、语音科技、神经语言学、语义科技等力量的联合攻关计划。只有通过全面开放以及与国内外同行

的合作交流，才有望建成具有影响的语言科技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基地。

十年前，我（2001）曾写道：“语言科技”的内涵是以理论研究为指导，以描写研究为基础，以应用研究为枢纽，促使语言研究向计算机应用、认知科学和现代教育技术领域等延伸，沟通文理工相关学科以实现语言研究过程及其成果的技术化。“语言科技”的外延为语言工程科技、语言教育科技和语言研究科技。其中，“语言研究科技”是将语言研究活动与资源建设、软件开发相结合，其目标是实现语言学自身的科技化。还应包含语言实验、数据处理这些实验语音学、神经语言学研究的科技手段。

虽然语言学家不可能也不必要都转向语言计算或实验研究，尽管描写、考据和内省始终是最基本的方法，但是具有一定的语言科技意识却非常必要。语言学家只有了解有哪些可供利用的资源、软件或仪器，才能提高其研究深度、精度和效率。语言学家也只有了解到信息处理的语言研究需求，才有可能为之提供可资应用或参考的基础成果。“语言科技”是21世纪语言学研究的潮流。

此为出版缘起。是为总序。

2011年8月谨识于南都

英文版前言

德克·吉拉兹

尽管词汇语义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显得日益重要，但是迄今尚无对词汇语义学理论发展趋势加以综合概括性的专著。本书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从历史视角展示语言学的词汇语义研究的主要传统，描绘词汇语义学这一学科从19世纪中期到当今的演变。

初始的基础性研究，是我在1986年用荷兰语写成的《词意：词汇语义学史略》（*Woord betekenis: een overzicht van de lexicale semantiek*. Leuven: Acco），其中包含了与本书思路大致相同的词汇语义学史的概述，不过早已不能适应其后日益繁荣的词汇语义研究。不论是章节结构还是叙述细节，本书都反映了那一论著之后20年来词汇语义研究的进展。

虽然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作为一个对典型理论和历时语义学有所贡献的词汇语义学家，以及词汇变异研究的词汇学家，我的研究主要基于认知语义学框架，然而本书是对词汇语义研究主要传统加以梳理，而不是用来支持这种或那种理论。不过，本书同时也坚持呈现了本人对词汇语义学学科及其发展的观点。尤其在总体立场上，还是体现出我对理论的明确选择。认知语义学感兴趣的焦点之一是意义与概念之间的关系，从而各种传统如何对待意义与概念之间关系的挑战，这一划分也就成为贯穿全书的导向性主题。更准确地说，我想绘制的历史路线揭示了这一划分，而这一划分是该领域演化背后占有优势地位的驱动力。

在本书写作的最后阶段，卢纹（Leuven）大学给了我学术休假的支持，并且得到了弗兰德斯研究基金会（the FWO Research Foundation-Flanders）的资助。这些年里，与我富有成效地讨论词汇语义问题的人很多，以至于无法一一列举。但是我对所有的人都心存感

激，因为没有他们的参与，本书的内容会贫乏得多。我要特别感谢斯皮尔曼 (D. Speelman)、赫伦 (K. Heylen) 以及卢纹大学定量词汇学与变异语言学研究小组的成员，在我离开期间他们仍然坚持不懈。我还要感谢穆尔代克 (F. Moerdijk) 和克里斯蒂安森 (G. Kristiansen)，他们的建设性评论像书夹子一样，始终支撑着本书的手稿。我希望他们都为这个最终成果而感到欣喜。但是我也意识到，作为一幅风景画，描绘词汇语义研究的画布实在太大了，而我用以勾勒的笔触，对于内行来说未免觉得粗枝大叶。在此，引用狄德罗的一句名言——人们可能期望我之所为尽善尽美，而我实在难以为之——以祈盼他们的宽容。

Dirk Geeraerts

词汇语义学史论的壮丽风景

——《欧美词汇语义学理论》译序

李葆嘉

语义研究在西方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西方的语义研究导源于意义的研究，而意义的研究肇始于古希腊哲人的“名实之争”（名称的形成是按本质，还是按约定）。可以认为，语义的研究植根于思辨词源学（Speculative Etymology）、文献语言学（Philology，或译历史语法学），直至历史语义学（Historical Semantics）而演变为现代语义学（Modern Semantics）。

西元前1世纪，古罗马语言学家瓦罗（M. T. Varro）在《论拉丁语》（*On the Latin Language*）中，将拉丁语研究分为词源学、形态学和句法学三部分，词汇语义研究包含在词源学之内。作为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西方语义学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德国。1825年，德国古典文献学家瑞希格（C. K. Reisig, 1792—1829）在《拉丁语言学讲稿》（*Vorlesungen über latein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mit Anmerkungen hrsg*）^①中提出了一种新理念，将语言研究划分为词源学、句法学和语义学/义符学（*Semasiologie*）三个分支。

尽管瑞希格的这一首创新为人知，但是却反映了德国的语义研究传统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由此可见，法国语言学家布雷阿尔（M. Bréal）1893年使用 *Sémantique*（语义学）这一术语有其学术渊源，并非突发奇想。而布雷阿尔的专著《语义学：意义的科学》

^① 李炯英提供：瑞希格的《拉丁语言学讲稿》初版于1839，Leipzig: Lehnold。原文参阅 <http://search.ugent.be/meer cat/x/ bkt01? q = 900000098931>。

(*Essai de Sémantique: Science des Significations*, 1897) 则成为西方现代语义学发展的里程碑。1894年, 美国哈佛大学梵文教授兰曼(C. R. Lanman) 在美国语文学会上宣读的《映射的意义: 语义学的指向》(*Reflected Meanings: A Point in Semantics*), 已经把“语义学”这一术语引进新大陆。

而在1896年, 俄国语言学家波科罗夫斯基(М. М. Покровский, 1868—1942) 在其《语义学方法论》(*О Методах Семасиологии*) 中也已使用了*Семасиологии* (语义学) 这一术语。波科罗夫斯基提出, 事物在现实中的联系决定了相应词语在语言中的联系, “一个词的意义史, 只有在研究这个词与其他与之同义的词, 尤其是同属一个现象范围内的词的联系时才能了解。”1908年, 瑞典语言学家诺伦(A. Noreen) 首次提出“义素/义位”(Sememe) 这一概念, 其七卷本巨著《我们的语言》(*Vårt språk*, 英文 *Our Language*, 1903—1924) 包括语音学、语义学、形态学研究三部分, 尤其主张建立不同等级的语义格, 成为句法语义研究的欧洲先驱。

现代语义学的第一块基石, 无疑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德国学者创立的语义场理论。这一理论的萌芽, 可以追溯至洪堡特(W. von Humboldt) 的人文语言学思想, 在其《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1836) 中, 已经出现了“义域”这一概念。作为“新洪堡特主义学派”的一批代表人物, 1924年, 伊普森(G. Ipsen) 在《古老的东方和印度日尔曼人》(*Der alte Orient und die Indogermanen*) 中, 提出“语义场”(Bedeutungsfeld) 这一术语。1927年, 维斯格贝尔(L. Weisgerber) 的《语义理论: 语言学的迷途吗?》(*Die Bedeutungslehre-ein Irrweg der Sprachwissenschaft?*), 为词汇场理论的建立进一步打下了基础。1931年, 特里尔(J. Trier) 受伊普森“语义场”概念的启发, 在其论著《智能意义域中的德语词汇: 语言场的历史研究》(*Der Deutsche Wortschatz im Sinnbezirk des Verstandes: Die Geschichte eines sprachlichen Feldes*) 中, 采用了“语言场”(sprachlichen Felde) 这一术语。与特里尔的“聚合场”相对, 1934年, 波尔齐格(W. Porzig) 在《基本意义关系》(*Wesenhafte Bedeutungsbeziehungen*) 中, 提出了“组合场”这一概念, 尤其关注“名+动”组合和“名+形”的组合关系。在“新洪

堡特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伊普森、维斯格贝尔、特里尔、波尔齐格的共同努力下，语义场理论终于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建立起来。

洪堡特(1836)提出：“世界观本身的形成要通过语言这一手段才能实现，……每种语言中都会有各自的世界观。”这一观点为新洪堡特主义学派继承并发展。作为该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人物，魏斯格贝尔在《德语词汇的意义结构》(*Vom Inhaltlichen Aufbau des Deutschen Wortschatzes*, 1939)中提出，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之间有一个语言这样的“中间世界”；语言不同，则“语言世界图像”不同；语言学的任务就是“通过语言分析，以揭示每种语言的世界观”。^②由此可见，德国学者创立语义场理论(展示不同语言的世界图像，揭示不同语言的世界观)的背景其实是新洪堡特主义，而非来自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灵感。换言之，所谓“结构主义语义学”，其本质上是“新洪堡特主义语义学”。

其实，索绪尔根本没有使用过“结构主义”这一术语。与“结构”含义相当的术语，在《普通语言学教程》(1917)中是“系统”、“形式”或“整体”。根据《教程》中的术语，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应为“静态语言学”(Static Linguistics)。直到1929年，布拉格学派的俄裔语言学家雅柯布逊(R. Jakobson)才这样表述：“如果要囊括当前各种科学的主导思想，再没有比‘结构主义’更为贴切的术语了。”(《浪漫的泛斯拉夫主义》)静态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德克海姆(E. Durkheim)的社会学理论(集体的、动力的)。把自然语言看作符号系统，正是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静态语言学的理论框架来自博杜恩(J. N. Baudouin de Courtenay)的语言学说。^①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许多语言学家先后以洪堡特学说的继承者自居，博杜恩也是其中之一。他们最赞赏的是洪堡特关于语言属于精神创造活动，视之为精神的产物和思维的手段的论述，这才使语言问题有可能转移到心理学立场上来。

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学者发展了语义场理论。随着英国语言学家乌尔曼(S. Ullmann)《语义学原理》(1957)和《语义学》

^① 参见李葆嘉《静态语言学的三个直接来源》(《理论语言学：人文与科学的双重精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1962) 的出版, 结构主义语义学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莱昂斯 (J. Lyons) 的《结构语义学》(1963) 和《语义学》(1977)、利奇 (G. Leech) 的《语义学》(1974)、帕尔默 (F. R. Palmer) 的《语义学》(1976) 陆续出版。可以称之为“英国语义学派”。

结构语义学的第二块基石是语义特征分析方法。1908年, 丹麦语言学家耐洛普 (K. Nyrop) 在其《法语语法学史》(*Grammair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中已经尝试探讨法语词汇的语义特征。20世纪30年代, 比利时语言学家布森斯 (E. Buysens) 受人类语言学和索绪尔心理主义的影响, 导入并定义了“义素/义征” (sème) 这一概念。与此同时, 苏俄语言学家别什科夫斯基 (А. М. Пешковский) 也曾提出过词义可分解为独立成分的观点。1943年, 哥本哈根语符学派的叶尔姆斯列夫 (L. Hjelmslev) 在《语言理论绪论》(*Omkring Sprogteoriens Grundlaeggelse*) 中提出, 语言的内容平面通过替换方法, 可以分析出数量有限的最小“内容形素” (éléments de contenu)。

在语言学界, 人们一般只知叶尔姆斯列夫的观点, 而对义征分析的其他先驱知之甚少。毫无疑问, 叶尔姆斯列夫的“内容形素”说受布拉格学派的影响。可以说, 叶尔姆斯列夫本人就是布拉格学派的外围成员。具体而言, 他接受的是布拉格学派的俄裔语言学家特鲁别茨柯依 (N. Trubetzkoy) 在《音位学原理》(*Principles of Phonology*, 1939) 中所使用的音位对立分析法的影响。而布拉格学派的音位观, 则是在波兰裔俄罗斯语言学家博杜恩的影响下形成的。^①

尽管20世纪30年代以前, 语言学家已经萌发了义征分析的设想, 但是最早从事这方面实践的却是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通常提到的是, 1956年, 美国人类学家古迪纳夫 (W. H. Goodenough) 的《成分分析和意义的研究》(*Componential Analysis and the Study of Meaning*, 对密克罗尼西亚 Truk 语的亲属称谓研究), 以及朗斯伯里 (F. G. Lounsbury) 的《波尼语亲属称谓的语义分析》(*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Pawnee Kinship Usage*), 在《语言》(1956年32号) 上

^① 18世纪后期, 波兰三次被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 一战后才再次独立。博杜恩于1875年获俄国彼得堡大学比较语言学博士学位, 创立了喀山语言学派。作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 博杜恩在19世纪末就提出了20世纪才被引起重视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同期发表，他们都采用了“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 Analysis）。然而，在这之前，1937年，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K. Davis）和瓦耳纳（W. L. Warner）在《亲属关系的结构分析》（*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Kinship*）中，已经设计了一套“亲属基元符号”，并且用矩阵图来分析亲属称谓。^① 换言之，美国人类学家的“成分分析法”来自美国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Structural Functionalism）。尽管社会结构—功能理论属于广义的结构主义，但是并非语言学的结构主义。

与之有别，基于语言学的结构主义的义征分析，是法国学者稍后才发展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波蒂埃（Pottier 1964, 1965）、克歇留（Coseriu 1962, 1964, 1967）和格雷马斯（Greimas 1966）提出，在词汇场中由功能对立来区别的“词汇要素”（lexical elements），语言学的义征分析才得以充分发展。可以推定，这一义征分析接受的是布拉格功能学派音位对立特征分析法的影响。由此可见，美国的成分分析法流派与欧洲的义征分析法流派，各有其学术渊源。^②

20世纪60年代初，兰姆（S. Lamb）、福德（J. Fodor）、卡茨（J. Katz）等将美国人类学家采用的“成分分析法”引入生成语法研究。1965年，乔姆斯基（N. Chomsky）吸收了卡茨、福德、波斯特（P. Postal）的见解，将语义规则引入转换生成语法，确立了句法、音位和语义规则系统的标准理论，从而形成了解释语义学。然而，罗斯（J. R. Ross）、拉考夫（G. Lakoff）、麦克莱（J. McCawley）等坚持语义规则是句法生成的基础，从而与乔姆斯基分道扬镳，在生成语义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催生了认知语义学。菲尔默（C. J. Fillmore）相继发表了《关于现代的格理论》（1966）、《格辩》（1968）等一系列论文，建立起格语法，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进一步演化为框架语义学。

此外，不得不提及的是，功能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韩礼德（M. A. K. Halliday）早在1961年就提出了词汇精密语法，而莫斯科

① 李葆嘉《语义研究与语言知识工程》（2009）第一节“义场理论和义征分析的发展”，未刊。

② 同上。